



爱国卫生运动发起前后



今年是我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我党领导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由来已久,但爱国卫生运动则源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美军发动细菌战

1952年初,此时朝鲜战场正呈现胶着状态。正值寒冬朝鲜半岛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现象:美军飞机多批次出现在志愿军驻地上空,但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只是盘旋片刻便飞走了,随后大量的苍蝇、跳蚤等昆虫残骸便接连成片出现在志愿军驻地周围。

寒冬腊月,这些昆虫成片出现明显违背常理,并且有昆虫残骸出现的地区,都陆续暴发了一些本在朝鲜半岛地区绝迹的烈性传染病,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经卫生部门检验,这些离奇出现的昆虫残骸中有不少带有霍乱弧菌和鼠疫杆菌。

无独有偶,一段时间后,类似情况在我国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各地也都陆续发现带有传染病菌的昆虫。

显然,这是美军针对朝鲜两国实施的一场细菌战。

■国际人士的调查

为揭露美军的罪行,回击美国当局对发动细菌战的否认,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同年3月至8月,朝中两

国政府先后多次接受了由国际人士组成的调查团队的独立调查。

1952年3月,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至8月,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

这其中,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最为详尽,影响也最大。这一委员会在经过大量调查取证最后形成了一份六百多页的详细报告,得出了严正判断: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军行径的同时,反细菌战防疫工作也同步展开。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对志愿军战士进行卫生知识教育、驻区清洁、疫苗接种等工作。我国国内的防疫工作也随即展开。3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划分为紧急防疫区、防疫监视区和防疫准备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广泛进行防疫宣传教育,在提高群众警惕性的同时避免引起恐慌。

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和参与热情,卫生知识和卫生习惯也得到大范围普及。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个月内,仅山东和北京、天津、重庆,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的人数就达1400余万;在吉林,50%至60%的农民都能够定期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

1952年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指示,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兼任爱卫会主任,各级防疫委员会也统一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同年年底,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被列入其中。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改变了生活习惯

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也带动了人居环境和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喝生水现象比较普遍。美国作家格兰姆·贝克在《战时中国》中就记载,一对靠砍柴为生的四川夫妻,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把生水烧开饮用。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引领下,全国各地的工厂、机关、学校乃至农村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现代卫生观念逐渐确立起来。

除了“喝开水”以外,今天许多习以为常的习惯和观念,包括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等,都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到千家万户。钩正平

历史短波

邓小平:迅速决定访美

1978年12月14日,在中美即将正式达成《中美建交公报》前夕,卡特突然指示伍德科克邀请邓小平访美。当时,美国国会一些人对中美建交很不满意,卡特总统希望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因此,美方对邓小平访美极为重视。邓小平在美方邀请发出后不到24小时便作出访美决定,时间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开启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9天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揭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

谢觉哉:为老战友愧疚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在湖南老家务农的一些子女、亲属希望他帮忙在北京找个工作。对此,谢觉哉一概拒绝,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与之相比,他特别怀念牺牲的战友,多方探求、走访、慰问烈士的父母、遗孀和后人,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1962年,他在视察湖南时有老战友烈士的亲属从乡下来访,但却两次被警卫人员阻拦。谢觉哉事后得知深感歉疚,写诗道:“政情民隐应常通,咫尺间如隔一城。安得浮云都扫尽,长安虽远若门庭。”

刘彩香:长征“女挑夫”

刘彩香是红一方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长征途中,刘彩香和另外10名女红军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任政治战士,主要工作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行军路上,她经常抬担架,为伤病员挑东西。一次在上山路上,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雨,刘彩香见新扩充进来的一个抬担架的民夫没来得及分到粮食和斗笠,她二话不说解下自己的斗笠给民夫戴上,又拿出自己的搪瓷缸,把仅有的一个冷饭团给民夫。当抬担架的民夫脚踩苔藓滑倒受伤后,刘彩香亲自顶上抬担架。路面因下雨而变得格外湿滑,刘彩香多次跪倒在泥石上,膝盖疼痛难忍。但不管受到多大的疼痛,她就是紧握担架不撒手,一口气爬上山顶。

年终奖并不是今人的创举,在古代就有了。

汉代时,因为皇帝在腊月腊日(即农历腊月初八)颁下赏赐,所以汉代的年终奖叫作腊赐。当时官员的第一梯队是三公,能够拿到20万钱,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0万元左右;得到赏赐的最低级别是虎贲郎,只能拿到三千钱,不过也差不多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至于汉代的基层公务员,他们得不到皇帝的赏赐,便自己想办法——将往来公务时包裹公文的皮质、丝绸、麻布等材质的袋子拿到二手交易市场贩卖,得到的钱在部门里分一分,就当作年终奖了。

古人怎么发年终奖

唐高祖建立大唐后,因为长久战乱、民生凋敝,当时官员的年薪比汉朝有所下降,甚至有的地方官都没有年薪。唐太宗贞观年间,百官在年终考核中,如果成绩上等,可以另得一个季度的俸禄,这大概相当于发年终奖了。但对地方衙门,朝廷则让他们拿着朝廷的公款和同僚的集资到民间放高利贷,所获的利息大部分自留,小部分上缴朝廷,自留的部分就归入地方小金库,当作他们的年终奖。

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年终奖则很低。就拿我

们最熟悉的包青天包拯来说,他任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月料(月薪)、餐钱(饭补)、茶汤钱(水补)、薪炭钱(取暖费)、添支钱(岗位津贴)等,算下来差不多万贯,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万元之多。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即便是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也不过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几坛酒。

相比之下,明朝官员就有点可怜了,没有年终奖不说,平时工资也少得可怜。正一品官员的月工资只有500公斤大米、1800文;正七品更低,只有65公斤大米、

160文,就这么点钱,官员们还要支付他们幕僚、随从的工资,和平时的办公费用,所以明朝官员们铤而走险、大肆贪污,变成了一种常态。

清朝皇帝年底会将年终奖装在荷包里赏赐大臣:大荷包一对,内装各色玉石八宝;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微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四枚、金银钁四枚,这也算是挺丰厚的年终奖了。

年终奖不只是官员们的福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之际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关键要看平时的表现。郭华悦